



学习园地

# 民盟在筹建人民政协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马驰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其实早在“五一口号”发布前,毛泽东就致信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告诉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5月1日,毛泽东致函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阐释“五一口号”的内涵,具体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泛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应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议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稿,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为宜统祈赐示……

1948年5月6日,民盟与民革、民进、致公、农工、救国会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6月19日,民盟总部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现阶段工作纲领》,决定把开展新政协运动,积极准备新政协的召开作为重要任务。民盟总部宣传委员会拟定了《新政协的提出与本盟的态度问题提纲》,正确说明了新政协的根据、性质、意义及民盟对新政协的态度诸问题,发动盟员开展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6月24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关重要。全国人士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经中共香港分局及华润公司周密计划,自1948年9月起,将民主人士分批秘密护送到东北和北平解放区。

1948年9月29日,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抵达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在火车站迎接,将他们送至马迭尔宾馆,并与早在哈尔滨参加工联大会的朱学范(2月28日抵哈)和早前转道朝鲜抵哈的王绍鏊会合。

沈钧儒等一行抵哈后,当即与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10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愿竭所能,借帑纾乏,今后一切,期待明教。”

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慰问首批抵哈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1月2日,沈阳解放,亦即东北全境解放。同日,李德全也由苏联抵哈并入住马迭尔宾馆。

1948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两次指示精神,约请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王绍鏊、李德全、朱学范、高崇民举行第一次“新政协诸事”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会者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了初步意见。

沈钧儒、蔡廷锴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尽快产生出席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大家对新政协由各党派及各方面组织筹委会负责召集的办法,均感满意,一致同意新政协必须排除南京所有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

蔡廷锴、章伯钧提出关于如何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他们认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可产生中央临时政府,待全国统一后,再考虑成立正式的中央政府。

座谈会讨论了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沈钧儒是在座者中参加过旧政协

的民盟代表之一,他扼要地介绍了旧政协召开的过程以及在旧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他指出:“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他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争取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归于徒劳,而且上了一个大当。”他又说:“尽管如此,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中共的关系益加紧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加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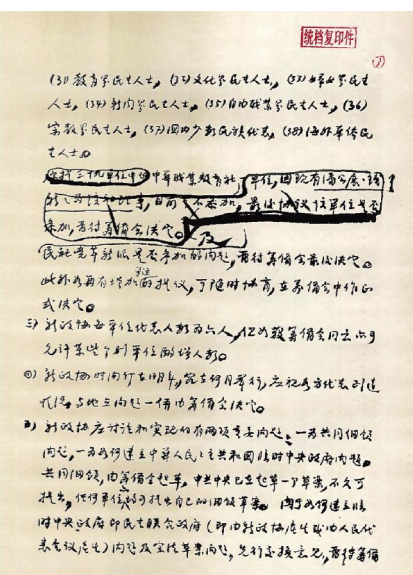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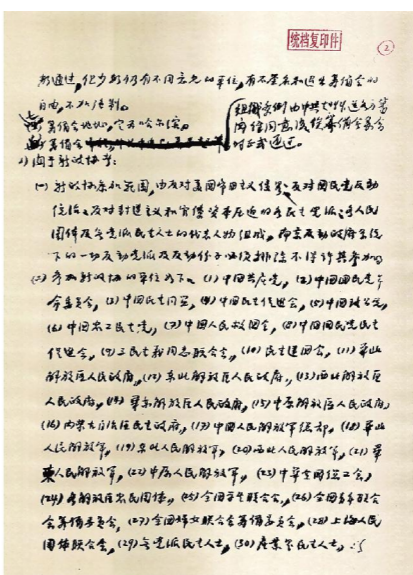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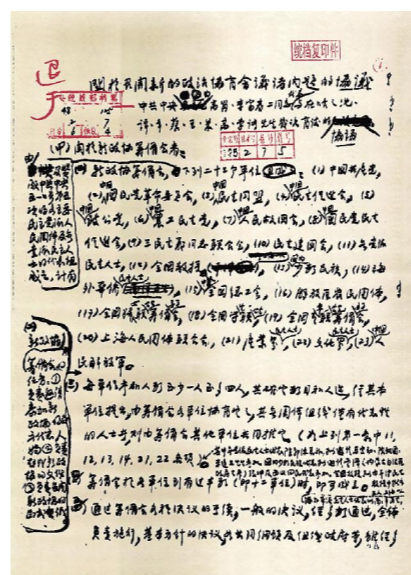
谭平山在发言中则较为系统地强调:“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朱学范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8年10月23日,根据沈钧儒的提议,中共代表同各位民主人士在马迭尔宾馆进行了第二次座谈会,旨在进一步听取其具体意见和建议。

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参加新政协的范围问题,发言更为踊跃。大家一致赞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充其参加,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中共中央不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还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从而为国民党开明人士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留有余地。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研究沈钧儒、谭平山等人所有意见和建议后回复:关于新政协筹备单位,同意增加“上海人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手稿

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但仍以平津教授为主,因为南方城市尚待解放,“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但仍以南洋华侨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者最多;在筹备单位中列入致公党,因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社会贤达”改为“无党派人士”并作为一个单位为好。关于各单位人数,提议每单位至少一人,最多四人,其确定数目与单位由各单位提出,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之。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东北局负责人赶到马迭尔宾馆,将中共中央的上述答复同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举行第三次座谈会,并就有关事项再次商谈。对此,沈钧儒、谭平山等表示完全同意,并提出两点新的建议,望速告中共中央:一是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6名;二是如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

11月20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以上“两点建议”。至此,经过三次座谈会,重要问题都已协商完成。

1948年11月25日,在马迭尔宾馆,众人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

议诸问题》协商并达成协议。至此,一份具有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特定标志意义的政治文件在这里达成。文件规定,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的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新政协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代表6人;新政协任务为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工作:《共同纲领》问题,如何建立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新政协召开的时间拟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至此,新政协的召开已经具备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民盟中有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周新民、罗隆基、楚图南七人参加。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与会的民盟代表共16位。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对新政协、新政权充满信心,他在致辞中指出:“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

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治体制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同时,他还勉励广大盟员:“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今天我站在中国人民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今天,我们仍要谨记张澜先生的教诲,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 纸笔烽烟:在上海,他们为抗战呐喊

●商志刚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胡愈之、黄炎培、陶行知、萨空了等民盟先辈以纸笔为武器,仗义执言,在上海积极“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其行其言,拳拳赤诚,皆成为激励后人续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 新闻出版界“全才”胡愈之

胡愈之是杰出的新闻出版业巨擘,长期在沪工作。“九·一八”事变期间,胡愈之应邹韬奋之邀在《生活》周刊撰文《一年来国际的预言》,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之后所写的《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表达了鲜明的抗日主张。1932年,他参与成立生活书店,协助邹韬奋制定了经营方略,成为书店的设计师和主要创办人之一。此间,胡愈之还为生活书店策划创办了《文学》《世界知识》。《文学》由茅盾、郑振铎主持,胡愈之担任主编;《世界知识》则由胡愈之亲自主持,此刊越办越大,抗战胜利后发展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救国会七君子,胡愈之担负营救的组织工作。经过长达8个月的不懈努力,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1937年7月底,七君子终于被无罪释放。

1937年,胡愈之得到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所著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随后认为此书详细介绍红军长征,较全面反映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旋即组织翻译,20余日完稿。彼时,沪上出版社多不敢公开出版此书。胡愈之决定自办出版社,取名“复社”,址设寓所巨籁达路(今巨鹿路)174号,并自任负责人。次年3月1日,《西行漫记》书名出版发行,首印1000册,很快售罄,半年内连印五六次,使广大民众客观了解了中共在陕甘宁根据地。

为了高举并宣传左翼文化,1938年6月15日,胡愈之又出版发行20卷本《鲁迅全集》。次年4月5日,他翻译出版斯诺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此外,还秘密翻印《列宁选集》和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八·一三”战事爆发后,胡愈之又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持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 萨空了主持《立报》力主抗日

萨空了于1935年任上海《立报》副刊主编、总编辑兼经理。在他主持下,《立报》力主抗日,争取民主,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萨空了担任副刊《小茶馆》主编,每天以“了”笔名发表一篇短文,为群众说话并教育群众,深受欢迎。报纸对“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及“八·一三”淞沪抗战,都有详细连续报道。

1936年7月15日,《立报》上登出了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指出各方面爱国力量,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能取得胜利。8月10日,毛泽东给沈钧儒等四人发了回信:“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其后《立报》更加明确了“团结、动员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方针,之后在日军和租界当局高压下被迫停刊。

### 黄炎培与陶行知在《申报》宣传团结抗日

1931年春,黄炎培到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在《申报》撰文揭露日本侵华阴谋,同时建议申报馆的史量才多做社会工作,被史量才聘为设计部主任。“九·一八”事变以后,史量才等组织手工业协会,商讨救国自救的途径。他还创办了《救国通讯社》(后改名《国讯》)。1932年1月28

日,上海成立地方维持会(上海地方协会),支援19路军进行淞沪抗战,他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1934年至1936年间,他先后走访浙、赣、鲁、豫、陕、鄂、川等省,宣传团结、生产、国防三大主张。

陶行知于1931年至1934年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他和黄炎培利用这块舆论阵地,极力呼吁全国人民应当精诚团结,共同抗日。他们一起策划并在《申报》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态度鲜明地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主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陶行知还用“不除庭草蒿夫”的笔名开设了《斋夫自由谈》和《古庙敲录》专栏,主张民主的政治,反对独裁专制,主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内战。蒋介石大为恼火,逼令黄炎培、陶行知、陈彬龢三人离开申报馆,并暗杀了史量才。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黄炎培任上海救后援会主席团主席,在调解国共冲突促成团结方面,居中斡旋。皖南事变后,他与生活书店合作,创办国讯书店,还用生活书店的纸型印行《革命文豪高尔基》《远东军事形势》等书,出版进步书刊,并继续出版《国讯》,发表他撰写的《延安归来》等文章。

此外,有“香山三老”之称的徐铸成、赵超构、陆诒三位报人在抗战时期行走各地,在香港、桂林、武汉、重庆等地通过办报和采访抗日稿件,为后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其中陆诒对台儿庄大捷等系列战地报道和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一书,更是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文字以外,在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法庭上,由著名摄影家舒宗侨(与曹聚仁合编)的《中国抗战画史》因其保存了大批战时纪实照片,真实地再现了抗战史实,而被国际法庭认定为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民盟先辈们以纸笔为戈,在抗战宣传战线中挥洒着光与热,今日吾辈应当接续薪火,以实干为笔,以创新为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奋力书写军民答卷。

(作者系民盟市委研究室干部)



钩沉

费孝通是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曾任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长期担任民盟中央主席。他曾于1930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3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

笔者的外祖父邓嗣禹与费孝通之间多有交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 结缘于燕京大学

邓嗣禹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38年获得燕京大学资助,师从费正清攻读哈佛大学博士,1942年毕业后长期为费正清助手。

1928年,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学习,在那里读了两年。对于那时的青年人来说,“亡国”的威胁是一把悬在国人颈上的利刃。正在习医的费孝通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关乎个人病弱,而是关乎会不会亡国,中国人要救亡图存!费孝通带着要了解中国、救中国,不当亡国奴的心情来到燕京大学。

1930年,费孝通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读本科期间遇到了影响自己一辈子的“好老师”——吴文藻。他比费孝通大9岁,他们两人在燕大成为亲密的朋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晚年。

当年,与传统大学教育模式有着明显不同,校长司徒雷登是把燕京大学作为一个大家庭来营造的,燕大的师生关系极其鲜明特色。每年开学,学校都要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要和每一位新生握手、言欢。同时,他还会在他的住所临湖轩为新生举行茶话会。

正是在这种“燕大一家人”的大家长影响下,历史学系的邓嗣禹与社会学系的费孝通相互结识,之后保持多年的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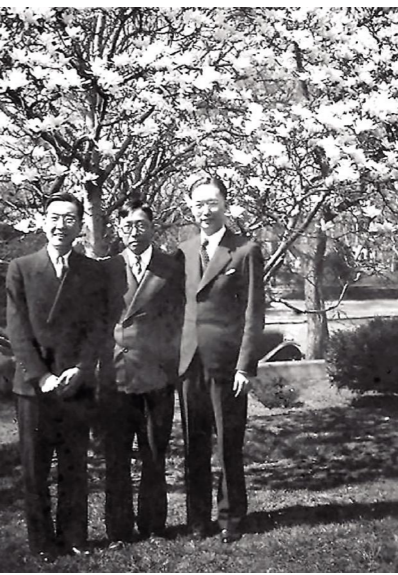
### 芝加哥大学相聚

1941年,邓嗣禹在哈佛大学博士尚未毕业时,便应聘到芝加哥大学在社会科学部东方语言系主任任上。12月7日,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期间,美国陆军为对外外交的需要,在哈佛、斯坦福、芝加哥等25所知名大学都开办有“陆军特别训练班”课程。1942年6月,芝加哥大学接受美国陆军委托,为参战军人举办“中国语言文化特别训练班”,简称ASTP。此时,邓嗣禹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执行院长,兼远东图书馆馆长,并主持培训班工作。

1942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代表美国国务院,在告知中国教育部的同时,正式向中国6所大学校长发出邀请函,请求他们各推荐一名教授赴美讲学。1943年1月底,这6位人选最后确定:云

## 邓嗣禹与费孝通

●彭靖



▲邓嗣禹与费孝通、金岳霖(自右向左)合影

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孝通,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金岳霖,中央大学生理学教授蔡楚,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刘乃诚,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张其驹,四川大学政治学教授萧作梁。这几位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除了张其驹、萧作梁外,其他4位都在国外受过高等教育,英语流利。其中金岳霖和蔡楚曾长期留美,金岳霖于192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蔡楚于192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刘乃诚和费孝通则是伦敦大学校友,分别于1930年和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这6个人当中,最年轻的是费孝通,时年32岁。

1943年6月到1944年7月,费孝通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6月,金岳霖与费孝通、张其驹等6人集中到重庆办理访美护照,并参加了5天的集训。集训后,他们由重庆飞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与讲学。

当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负责费孝通的北美旅行。费正清作为费孝通的特别助理,也曾为推进此项目的实施做了大量工作。他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记载道:“到1943年底,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6位教授前往美国,在我的督促下,哈佛燕京学社为6位教授每人赞助1000美元,其他8位教授每人500美元,共计1.5万美元。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也按同一方针组织了类似的援助活动。”

8月5日至7日,来到美国两个月之后,费孝通与金岳霖一行被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了题为“不可征服的芝”的论坛,到会的有美国学者40多人。6位

华人教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向听众演讲并介绍了中国抗战以来的情况,并与参加论坛的美国学者、学生展开讨论。这些演讲和讨论文稿经过整理之后,结集为《来自不可征服中国的声音》一书,194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邓嗣禹接待过费孝通与金岳霖,并在校内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 回国访问的两次会面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并且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之后,在海外的中国学者陆续有人回国探亲、访问。而且,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国际知名学者,因此他们重访中国的举动也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在他们离开中国之后,不断有人请他们发表谈话、发表演讲,谈他们重访中国的印象。其中,有些学者发表的长篇文章、回忆录书籍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供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们借鉴。

1972年6月,作为第一批被邀请回中国访问的美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邓嗣禹踏上“重访中国”的历程。1978年他再次以学术考察的方式访问中国,1979年出版过一本英文版的回忆录——《一位海外历史学家对中国的评论:1972年的第一次旅行》。1978年的第二次旅行,在封面的显著位置,他用中文题字:“故乡明月。”邓嗣禹在前言中写道:“书中有许多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形势的报告,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新动向,中国人民的个性和文明程度。有一些内容是对旅游前的准备、观光时需要的设备、所到之处的看点、考古的地点、中国的经典艺术,我在学术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介绍。”

邓嗣禹还在书中回忆:“1972年7月14日晚,受外交部礼宾司邀请,住在华侨饭店的邓嗣禹等七八个人,被邀请到北京老舍茶馆丰泽园共进晚餐。外交部驻波兰前大使,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权担任主持人。应邀参加的来宾包括: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著名作家冰心,以及她的丈夫吴文藻,著名学者、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等人。”

1980年3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邀请费孝通前来演讲,前后共有3天的时间。此次,时年75岁的邓嗣禹曾邀请费孝通在家中吃饭,并尽可能地热情款待。“寒舍请他吃晚饭,家中无佣人,老夫妻亲手做十来样菜,兼招待费孝通。”(作者系邓嗣禹外孙,现居上海市建设路总支部委员,本文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25年06月11日第11版)